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十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八期 ——
(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1 d)

【往事追忆】高行健谈文革经历(续)

【历史资料】“革命”年代的绝妙教材——文革时期中小学教科书摘选

(1967年—1969年)

何 蜀辑录

交白卷自白

张铁生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人民日报》编者按

给《北京日报》的信

黄 帅

日记摘抄

黄 帅

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

——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公开信

黄 帅

【亡灵祭坛】文革受难者李文波

王友琴

文革初期湘南屠杀回忆

山 人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往事追忆】

高行健谈文革经历(续)

【续“高行健谈文革经历”，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十四)，z k 0 0 1 2 a】

访问者：陈军

陈：你的父亲呢？

高：他当时要自杀，活不下去了。我对他说：你怎么也得活着呀。你要是自杀，那我们怎么办呢？你的罪名不就更重了？本来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呀。但是，一说起来，他就哭，说怎么也活不下去了。后来，我不在了，回到北京。我父亲就被关了起来进行劳动。原因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一九三七、三八年抗战开始时逃难。他因

为在银行里有些权力。银行里有银行的警卫来保护钞票，所以就储备了枪支。我父亲并没有买枪，因为我爸、妈都是非常温和的人，也怕枪走火之类的。但是，他有个同事想买支枪，因为那时在逃难中都带着点金子（那时钞票都贬值），生怕有土匪。所以我父亲就从警卫那给他的朋友买了支枪。后来到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们工作都得填登记表，说说解放前都干过些什么。其中就有个“武器”一栏。我父亲已经都忘了买枪那事了，都多少年的事了。可我母亲还记得，就把曾经替人家买枪的事写了上去。可见，他们那时有多单纯啊！单纯得都不能想像！好，这事就存在档案里了。后来，居然所有干部的档案都给调查了，一直调查到买枪的那个人还在。他怎么敢跟人讲他买过枪啊？解放后，他因为害怕，就把这枪扔到河里去了。等来调查他的时候，他就说没这事。所以后来在我爸的档案里就记载了：查无下落，私藏枪支。你瞧，共产党多厉害呀！到了文革，这事就给翻了出来，加上我父亲又是右派擦边，那还得了？结果他单位里的造反派把这事给捅出来了。造反派他们去冲政治处、政治部，把他们的档案给看到了，就把这事弄了出来。我爸到那时才知道，就为这事背了黑锅了。后来这事是我去调查的。我爸他不能告诉我这事呀。我就问他：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呀？后来在混乱中，我就查到了那个买枪的人。买枪的人说：是他买的。但他把枪给扔到河里去了。他说现在怎么办？慌乱之极，也不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们带来了怎么多的麻烦，现在我老婆已经退休了。如果再来调查的话，我可以告诉他们实情。而且，如果他们查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话，那也是可怕的事，那也会牵扯到很多的人。如果我的档案现在在中国还有的话，我爸的这个事还会在我的档案里。这是为什么当年老红卫兵要整我，说我有问题，说我的家庭有问题，就是这个。所以我不得不反，不得不顽抗到底。我非得跟他们顽抗到底，你得很凶狠，不怕他们。你也得像个恶徒一样跟他们对骂，在群众大会上跟他们对骂，说：你要是敢来抄我的话，他妈的，谁来抄我，我们就抄谁，反正我们这也有一伙人。这就是我说的人人都是暴徒。我那时一副活脱脱的暴徒的样子。我们互相对骂，用尽了所有的粗话对骂。因为均衡的力量，他们不能动我。

陈：你现在回想这些的时候，有没有后悔的地方？

高：我觉得我根本不该参加什么造反派不造反派的。我怎么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是一句话不说。但是做不到。最好是什么都不做就能保护自己，但那是不可能的。

陈：你有没有可能被忽略掉？

高：你不可能被忽略掉，因为如果一个人被忽略掉是很奇怪的，那等于他什么都没有，那就一定很古怪了。那你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我当然想能被忽略掉了。我以前做的事就是想被忽略掉。我白天都是在应付，到晚上才看书和写作。白天上班都是打瞌睡，没精神。所以，那时学校、机关里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别人都知道的事，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不感兴趣。这是我的一种隐蔽。但是到文革的时候，谁都得响应，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掉。

陈：你父亲自杀的时候在哪里？

高：在军管以后。那时候的机关，包括他们的医院都被军管了。他后来受不了，就自杀了，吃了一瓶安眠药，但是被他的邻居发现了。邻居看到他呼噜呼噜地喘，这时人已滚到地上了。然后他们就把窗户敲破了叫他，他不应该，还是呼噜呼噜地喘。这时就赶紧把门打破，一看不得了，就赶快送医院，给及时抢救过来了。他们说他们畏罪自杀，接着就给他送去农村劳动了。送到哪，我都不知道。他们医院的系统也有自己的农场。

陈：那你弟弟呢？

高：我弟弟也是瞎胡闹，因为他那时候也还小。他就因为这些事情给耽误掉了，而且时间也晚了。他要的地方，几次初试、复试都录取了，结果还是不行，他就这么给耽误了，所以他当时一肚子不满。后来他连公家学校的老师都不能当，他就只好在南京当了民办教师。后来，他就去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去玩去了。

陈：你当时大学期间交往的那几个中学同学呢？

高：其中一个被怀疑是特务，因为他有个收发报的收音机。因为他在野外做勘查工作，因为他要学英语，原来学的是地质专业。因为他当时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同时拿着一本字典在学英语。因为他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把他打成特务，说是跟外头联系，但没有证据。结果是吊打审问，而且后来到什么答7 b度呢，他被写上通告，枪毙，立即执行。他是被倒吊过来打呀！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搞的。枪毙是当众执行，可那是假的。当时他供不出来，供出来的特务又能是谁呢？怎么联系？又能有什么情报？因为他供不出来，说他不老实，所以枪毙。实际上，他是被枪毙过，是拉去陪绑。也不是真的枪毙他，拉到野外去，枪一响，他以为自己被打死了。后来觉得怎么还有意识，怎么还没死呀？原来是放了空枪，对他实行假枪毙。

陈：你后来怎么生活的？还能继续看书吗？

高：我是主动到农村去，干校呆不住，主动到农村去落户。我是逃到农村去落户的，这是没有的例子。人都在干校里耗着，我觉得太恐怖。我亲眼见了那么多事，觉得自己是捡了一条命。我如果再呆下去，不是被打得半残，就是被打成反革命。那时要去落户，极为复杂，很不容易。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去当个农民，想当一个无人知道的人。我吸取了教训，我再也不要表明我对政治有一丁点的兴趣。我再也不要表现我懂得一丁点的人世。我最好能变成混沌中的农民之一，就是种地、求生、谋生，安安静静地谋生。我想，农民至少可以有一间草屋自己住吧。有一间草屋，我可以看看书。我那时还不敢写。后来我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当了个农民，把自己北京的户口丢掉，当时就想逃命。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再回来，完全没有想到。只有那个时候，我除了活下去以外，开始写作。写作是唯一成就我自己不被憋死的一个寄托。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发表，所以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发表不发表是不重要的；他人喜欢不喜欢也是不重要的；读者觉得成功不成功，都去他的，也不重要。只有我能透彻地消遣我自己的心境，这就是最大的安慰。直到现在，我觉得我只要能无忧无虑地、毫无顾忌地写我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一个自我保护，最强大的自我保护。因此，你就敢于包括承认自己曾是个暴徒。我觉得都跟这一点有关系，这样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只有这样，哪怕不跟别人，至少能跟自己有个真实的对话。这就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事情。

陈：你后来在农村的生活真的就能那样平静吗？

高：没有。比如结婚，我自己的老婆都揭发过我。我是文革开始后结的婚。我是在极匆忙的情况下要找一个女人，结婚。我要结婚。我那时已经到了农村，她也到了农村。她的出身跟我一样。她的老爸当时是个大学教授，也是个反革命分子，所以她情况比我还惨。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她跟了我，觉得至少是个保护吧。她幻想已经都没有了，但是她还要进步。她心里很恐惧，实际上，抵抗恐惧是很困难的。你要有很大的力量和清醒才能抵制恐惧。我们当时两个人到了农村，已经到了最底了，觉得这就可以了，还能怎么着呢，所以来了就在一起了。那我一写作，她看了我写作。我当时写了一首诗，第一句就是：我不信上帝，不信菩萨，不信所罗门，不信阿拉。从远古人的图腾到文明人的宗教，啊。。。反正是这么一种感慨。她看到这个，就拿了个当成反革命的东西把我揭发了。后来我赶紧跟她分开，但我又不能刺激她。她恐惧到什么程度呢？她恐惧到神经错乱，她真的神经错乱。她觉得

我是个反革命，随时就可以让她遭殃，让她彻底毁灭。于是我先毁灭你，先揭发你。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妻子揭发老公，儿子揭发父亲。那都是恐惧。因为恐惧到这个程度，我说她疯了。那真是决斗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她拿尿罐子朝我头上砍，我还不能让农民知道。刚结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一定有什么鬼。我只能装得很平静。后来，我们就离婚了。

陈：你有这么多的观察，又生活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你怎么处理这段婚姻关系呢？

高：厌恶！我表面若无其事，嘻嘻哈哈，跟农民混得挺好，能受苦。我还带了点东西下去，请喝酒。你们讲什么话，我也讲什么话，因为我要在这里生根。我要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我写作，没有人还知道我在读书。我是带着书下去，摆了一套列宁全集在桌上。他们觉得这是北京下来的干部。这就把我给保护起来了。底下，我就读自己的书，像托尔斯泰、黑格尔的书，都有。我表面上跟农民打成一片，跟干部打成一片，让他们觉得我是个好的人，爱吃、爱喝，有一点钱就花掉。我要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假像，但私下里我开始写文革，写了四十万字。写的稿子埋在土里。我要是让我老婆找到一个纸片，就可以枪毙我了。那个时候太容易了。只要她告发我，我就可以被枪毙。那时我把自己隐藏得很好，跟老婆也分开了。我把所有的工资都拿出来请人吃饭、买东西，想把我的老婆弄走。那时的东西也便宜。我那么送礼和请吃饭，买通了。结果，照顾她，把她送到县城。我们两人的感情问题，别人也知道一点，但总算没出大的事。后来有很多很多极为复杂的事情。这些我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

# 【历史资料】

“革命”年代的绝妙教材——文革时期中小学教科书摘选

(1967年—1969年)

• 何蜀• 辑录

【简要说明：“教育革命”的口号是自50年代起就提出来的，在“大跃进”年代里和文革前夕都曾掀起过高潮。在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这种革命自然“不断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到文革中已登峰造极。如今人们一般都还记得文革中大学停止招考，各学校停课闹革命，以后又是中学生下乡、工宣队（农村是贫宣队）占领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已很少有人记得或注意到文革时期中小学复课后曾有过这样一些史无前例的“革命教材”在课堂上向青少年学生们灌输。当年的中小学生们。还记得自己那时受过的这些“革命教育”吗？重读这些教材，令人产生许多感慨。这些早已被人淡忘的“革命遗迹”，理应发掘出来，放进文革博物馆中供后人参观、研究。】

◇ 1967年8月上海市小学教材编写组：上海市小学暂用课本《算术》（六年级第一学期用）第二单元摘选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 二. 百分数

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常常要用到分母是一百的分数。例如：先锋电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后，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今年第二季度的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八，六月份的总产值相当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百；东方红纺织厂，今年上半年棉纱的

总产量，完成了上半年生产计划的百分之二百零九点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中呈现出一片大好形势。光明生产队夏熟作物的总产量今年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象上面这些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的数，叫做百分数。

百分数通常采用一种简便的写法，就是去掉分数线和分母，在分子后面加上百分号“%”。例如：百分之六十八写成68%，百分之二百写成200%，百分之一百零九点七写成109.7%，百分之七点九写成7.9%。

写出下面各数：

(1) 上海照相机二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二月份主要产品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

(2) 吴泾化工厂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五月份主要产品合成氨的产量，比四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三。

(3) 红旗电表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前，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破坏，1月中旬只完成全月计划的百分之二十八。夺权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下旬完成了全月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一。六。

(4) 从1966年到1967年全国粮食征购计划到2月20日止，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五六。

(5) 上海工业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工业生产呈现一片大好形势。今年一到五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

(6) 重型机械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四、五两个月完成的总产值相当于一季度的百分之八十四。

◇ 1969年1月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数学》第二册《第四章·简单图形》摘选

### 垂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海第三钢铁厂的工人师傅敢想、敢干，把两座高达五十五米、重二百三十吨的巨型平炉大烟筒，分别用了八个小时和五个小时，“垂直移位”三十一米和四十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垂直移位”就是大烟筒在移动时，和地面保持垂直。在数学上，如果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就说它们互相垂直。……

### 平行线

曙光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教导，在夺得夏粮大丰收之后，又投入新的战斗。双轮双铧犁奔驰在人民公社广阔的田野上。用双轮双铧犁犁出的两条笔直的垅沟是互相平行的。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

## 三角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刻，又一曲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凯歌响彻云霄。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长达 6 7 0 0 多米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建成。从图 4—2 0 中，可以看到凌空飞架的巨大钢梁，笔直地横卧在矗立江心的桥墩上，排列整齐的三角架有力地支撑着大桥的钢梁。“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大桥的钢梁为什么要用三角架结构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三角形有如下的特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按照角的情形，三角形可以分为三类：……

### 简单轴对称图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让我们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厚阶级感情，剪个“忠”字表忠心。我们剪“忠”字时，可以把纸对折起来剪（图 4—3 9）。因为这个图形沿着中间的直线对折过来，左、右两部份能够完全重合。一般地，如果把一个图形沿着中间的直线对折过来，直线两旁的部份能够完全重合，这种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叫做对称轴。能够重合在一起的点叫做对称点。……

### 等腰三角形

观察图 4—1 9（注：原书排错，应为 4—2 0）南京长江大桥钢梁结构中的三角架，可以发现这些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等腰三角形是特殊的三角形，它有些什么特殊的性质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轴对称图形的一般性质。……

### 等边三角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等边三角形的性质。……

## 习题二

……

1 1，我们要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脑子里要印上“忠”字，心坎里要刻上“忠”字，口里要宣传“忠”字，行动上要体现“忠”字。让我们动手剪个“忠”字表忠心。

1 2，正当全国亿万军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乘胜前进的时候，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让我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利用轴对称原理，剪个……

◇ 1 9 6 9 年 7 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重庆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一年级用）第一单元摘选

## 语文知识（一）

### 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工农兵群众写的一首首诗歌，一篇篇致敬电，用最美好的语汇、最完美的形式，表达最美好的愿望，抒发了工农兵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一字字，一句句都凝结着无产阶级的激情。工农兵的语汇最丰富、最生动、最切实、最有力。过去，那些资产阶级语法“学者”，把语法修辞吹得非常神秘，其实他们“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根本不懂得语言，真正善于运用语言的，真正懂得修辞的，是工农兵群众。下面介绍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例如：

- 1，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 2，舵手来了！救星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源来了！

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是大海航行的舵手，象这种写法，叫比喻。

3，敬爱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您的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深扎根，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焕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工农业生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气腾腾。

把句式相同或相近的句子连在一起，尽情抒发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象这种写法，叫排比。

- 4，井冈扬臂举红旗，赣江奔腾来报喜。

工农兵运用革命的形象，给山水以无产阶级感情，象这种写法，叫拟人。

5，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开辟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通天下，您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正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掌握。

6，从此，“不周山下红旗乱”，国际壮歌冲九天，中国工人运动沿着您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林彪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写作时选用毛主席的语录和诗词，来说明问题，阐述观点，表示决心，就更有战斗力，更有说服力，象（像）这种写法，叫引用。

以上所说的修辞方法，课文里用得很多，阅读时要深刻体会工农兵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工农兵的创作中，有许许多多生动的语言、多种多样的修辞方法，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教导，下苦功学习工农兵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更有力地批判资产阶级。

（注：原教材中“毛主席语录”均以黑体字排印。）

∞ ∞ ∞ ∞ ∞ ∞ ∞ ∞ ∞ ∞

交白卷自白

• 张铁生 •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缺席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都是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 ∞ ∞ ∞ ∞ ∞ ∞ ∞ ∞ ∞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人民日报》编者按：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发表了红小兵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按语。现转载如下，供同志们学习研究。

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像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同时要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实践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各项政策，使青少年们更加朝气蓬勃地成长起来。

《北京日报》编者按：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



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路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是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支持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许许多多像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有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 and 同学们把在这一关键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便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 《人民日报》1974年2月12日

∞ ∞ ∞ ∞ ∞ ∞ ∞ ∞ ∞ ∞ ∞

给《北京日报》的信

• 黄 帅 •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导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教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期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的“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 ∞ ∞ ∞ ∞ ∞ ∞ ∞ ∞ ∞

日记摘抄

• 黄 帅 •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X X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他带理不理，不像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X X X……，你内心非常爱听X X X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误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X 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老师批评我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像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X X X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X X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X X在课上向老师提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的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评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在这次斗争中，你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 ∞ ∞ ∞ ∞ ∞ ∞ ∞ ∞ ∞

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  
——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公开信  
• 黄 帅 •

《人民日报》编者按：革命小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革命精神，热烈赞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说得有理，驳得有力，值得一读。

这件事情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坚持革命，还是折中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教育战线广大师生要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王亚卓同志：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看到你来信的贴 d 头语，使我不平静地读了好几遍，和你一样，我对你的来信也“想了许多问题”。报上发表了你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引起你给我这封不平常的来信。春节几天，我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同父母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反复研究了你提出的意见和你同我们的分歧。欢迎你对我这封信继续提出批评。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来信说：“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作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我认为，我们根本的分歧就是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好”，还是“糟”？我们全班、全校、北京市和全国都出现了如《元旦献词》指出的一一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过去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使师生对立；今天是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使师生重新团结、战斗在一起。现在我的班主任老师革命干劲更大了，他说：“教育革命对我加强了世界观的改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做好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永远不忘记受到的深刻教育。”他已成为我们的好战友、好榜样、好“班长”。有一位过去教过我的老师还主动来班征求意见，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这位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班上，同学们写出的大字报、小字报一批又一批，纪律自觉遵守，劳动不怕出汗，学习质量提高，后进的同学也赶上来了，成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领巾班。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不是拍手叫好，而是埋怨指责，这只能说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你说：“继你之后，又出来个辛苦愚，说的话更是没道理”，还说在报纸上“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要看到指责老师的文章”。看来你真的是一个既“关心”批修又“同情”老师的人了，因为我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捡来的？在你的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的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让我们这群

毛孩子要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高压、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你是一位政治工作干部，来信说：“出于关心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你关心的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判断“香花”还是“毒草”的政治标准，你把我们革命的师生引向分裂、把我们从教育革命前进的大道上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虫。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是多么相似！希望你立即猛醒！

你对我“要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的确我们的分歧是存在的，是严重的大是大非不可调和的分歧。林彪一伙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开历史的倒车，办不到，办不到！在十大精神鼓舞下，我们青少年就是要发扬“五敢”精神，要斗，要狠狠地斗，才能坚持进步，坚持变革，坚持革命！

你的来信帮助我认识到，在革命大好形势下，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我要把手拍得最响，把声放得响亮，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红小兵 黄帅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李文波
• 王友琴 •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1966年8月25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向高潮之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的唯一姓名

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

，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随同那场残忍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中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63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所谓“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8月，其中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题为“榄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文章说，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文章写明是红卫兵先殴打了李文波夫妇；文章还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当成他们的“英雄”历史。

二十三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李文波事件在事实方面与过去不同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便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如果被害者能象害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通过比较，我们不但能在事实方面，也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入的理解。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他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份支持。

判决李文波妻子死刑，虽然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时，即使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初中红卫兵。他们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打人。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8月24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交上了他们的房产证书；他们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但没有人死亡或者受重创。

李文波夫妇的家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121号。这座房子建于50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文波一部份居住。李文波在1949年以前有小产业，1966年时没有正式工作，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孩子，他们在被抄家时逃开了，后来又被关在崇文区公安局里。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第二天，1966年8月26日上午，北京海淀区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差一点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

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会议开始时，一般的教职员列队从东门进入会场；当时已被打成“黑帮份子”的老师、干部则从西门进去，他们中有附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人。这些从西门走入的人早在8月初就已经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那晚的全校大会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夜。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会后她昏迷在地，是由她的丈夫把她背回家去的。物理老师刘树华从东侧进门时，红卫兵大声命令他站到“黑帮份子”那一边去。刘树华26岁，刚结婚不久。结婚前他曾追求另一女子未成，红卫兵以此说他是“流氓”，在学校的墙上给他画了一张桌子大的漫画，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字。那天晚上刘树华和其他“黑帮份子”一起被毒打，他和邢家鲤被打得最厉害。“斗争会”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身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同一版面还刊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一轮暴力迫害的借口。当时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8月27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8月28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据说共有十多个。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1966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8月26日，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

艺出版社，1995，第152，155页）新风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2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325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统计资料，在北京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是四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其中又以西城区为最，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人数总和。西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红卫兵最早建立和开始活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的关系很大。

1966年8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压、尸体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者说，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死者浑身血迹，衣衫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发生李文波事件

1966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列成表格，展示如下：

红卫兵打死人数：

8月24日：44人，
25日：86人，
26日：125人，
27日：228人，
28日：184人，
29日：200人，
30日：224人，
31日：145人，
9月1日：282人，

2 日：3 9 人，
3 日：2 4 人，
4 日：2 1 人，
5 日：1 3 人，
6 日：8 人，
7 日：7 人，
8 日：5 人，
9 日：4 人，
1 0 日：2 人，
1 1 日以后知道日子的 2 0 人。其他还有日子不详的 8 8 人。

从这一表格可以看出“李文波事件”前后的红卫兵暴力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 月 2 6 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三位数；从 8 月 2 5 日到 8 月 2 6 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 8 月 2 6 日到 8 月 2 7 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 9 月 1 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 8 月 3 1 日，却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8 月 3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大批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天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对小了。

表格也显示，从 8 月 2 4 日到 8 月 2 5 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此后，8 月下旬每日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时，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 1 9 6 6 年 8 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红卫兵最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 7 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接着，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 月 1 7 日，北京 1 0 1 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出面制止。

1 9 6 6 年 8 月 1 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对老师使用暴力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天安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合影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连续 7 d 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一位干部说，在 8 月 1 8 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的当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牛鬼蛇神”的行动。在“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他们在“八一八”大会之后也立即采用了当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动成了全国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 8 月 1 8 日会见的第二天，8 月 1 9 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8 月 1 9 日晚上，北京外

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8月18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1966年8月23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29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小时。作家老舍在这一天被“斗争”之后的第二天，8月24日，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2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6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十多年前开过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70来岁，马大娘50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她们的尸体。东厂胡同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1966年9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二附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她曾在给儿子的一封信里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8月28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90年代中期见到他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康。

上述杀戮，都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或者同一天。显然，这些杀戮跟红卫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丝毫因果关系。上述一系列暴力行动和杀戮发生的时间次序明显表明，暴力升级的主要动因，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声势浩大的接见。“八一八”接见之后，红卫兵杀戮开始大规模升级。李文波事件发生于八月杀戮的这大规模升级过程之中。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下，唯有李文波、曹滨海两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两个事件发生在同一天。

李文波、曹滨海与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整个形势来说，是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大规模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假使没有这两个事件发生，八月杀戮的大规模升级也是一样要发生的。

四，为什么无人反抗？

1966年9月5日，李文波死了10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份。

1966年10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不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当年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这数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弹射杀的，也不是被刀砍死的，而主要是被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铜头皮带抽死的、用沸水烫死的……总之，是以形形色色残忍手段虐杀的；被打死的过程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跟一刀断头、一弹毙命相比，这样的死亡过程更加痛苦。这样的杀害当众进行，造成无比的恐怖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杀害数千人，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野蛮和凶残。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特别需要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在这样野蛮残酷的杀戮中，为什么只发生了两起事实上还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滨海，是1966年北京八月杀戮中被红卫兵指控为进行了反抗的仅有的两个人。其他被打死的数千人，还有被侮辱被毒打的无数北京居民，在铜头皮带和棍棒的凶狠攻击之下，都一直克制顺从，纹丝不动，甚至隐忍至死。这是为什么？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上文写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后自杀了，1980年，笔者和肖军先生（他是在1930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谈话。肖军在1966年8月23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红卫兵毒打。肖军告诉笔者，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如果他反抗，其他近三十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

李文波跟肖军不一样，他在现场就被打死了，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可能说出来了。李文波的妻子目击了丈夫被打死，然后她自己被枪毙，也永远不可能描述她的感受了。但是，肖军事后说出的心理活动，清楚地说明，1966年夏天在北京之所以无人起来反抗，不是由于迫害不够深重，恰恰相反，是由于那场迫害太残酷了。

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又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

1966年8月29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整个“通令”有七个部份，最后一个部份的小标题是“七、给出路”。其中一段照录如下：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份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份连当时的所谓“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这样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何自我辩护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毆死在火车上。假若李文波能从8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中的一个。

这场大规模的居民驱逐，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显，在此之前的八月杀戮，为这场驱逐的顺利进行预先建立了威慑。这十万人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作选择。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这场残酷的驱逐，是文革领导者安排的八月杀戮的结局。

李文波已经死了34年。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报导出来；和李文波夫妇在同一个时期被活活打死的数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十万北京居民的故事，也还没有被报导出来。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通史，都几乎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八月杀戮及其大批受难者。

∞ ∞ ∞ ∞ ∞ ∞ ∞ ∞ ∞ ∞

文革初期湘南屠杀回忆

• 山人 •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步行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出现在湘南宁远县的公路上和县城，他们在县委招待所小住一、两日后，又继续他们的行程。

不久后，贫穷、落后、偏僻的宁远县城也翻腾了起来。以各行业、学校、公社以及乡知青各自命令名或依照省城长沙“造反派”的名称，各自都打出了自己的旗帜，戴上印有各自“造反派”名称的红袖套。参加了“造反派”，有枪的基干民兵们把冲锋枪、三八大盖等背在肩上，随身不离。那些没有枪的“造反派”们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刀、梭镖，在肩上。他们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捍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等等各种“革命”的口号，气势汹汹、跃武扬威地招摇过市。他们抄“地、富、反、坏”四类份子的家，抓县委书记、县长等游街，冲县武装部抢夺枪支、弹药，砸烂文庙里的孔夫子牌位，把文庙里大石头柱、牌坊上的龙头、凤头、狮子头统统敲得稀巴烂，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状元楼、贞节牌坊

等等古迹也被他们砸烂了。凡是可以写大幅标语的墙，都写上了“革命”的标语口号。凡是可以贴标语的地方，也都贴上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或者“毛主席语录”。这个“造反派”抓县委书记游街，那个“造反派”抓县长游街，街道居委会的“造反派”抓“地、富、反、坏”四类份子游街。被游街示众的人都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走资派X X X”、“打倒地主份子X X X”等等。我也曾被凑数戴着高帽子，挂着“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牌子，被捆游遍了东、南、西、北四门的街道，回家后斗个月双臂不能动弹，至今还留有残疾。

“地、富、反、坏”四类份子除了被去游街外，还必须把分配给自己名下的地段每天打扫乾淨。每半个月必须集中在城关派出所，汇报自己半个月的所做所为，接受派出所长和指导员的训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更不准他们的子女参加“造反派”。在那些“地主份子”当中，有一些是被强加上一顶“地主份子”帽子的。我的母亲就是因为我父亲蒙冤坐牢后，回到家乡被强加上去的“地主份子”我父亲解放前若干年就是银行职员，解放后为商业厅的干部，后被送去劳动教养，长达六、七年之久。解除教养时已被折磨得周身都是病了，回到家乡不久去世。后来得到平反昭雪，他的尸骨早已烂尽了。

其实，那些所谓的“四类份子”，经过自解放后的肃反、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等等运动，十多年来已经是被压迫“改造”得服服贴贴、唯命是从，不敢违法乱纪的了，比贫下中农和其它的人更加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不敢乱说乱动的了。

一九六八年初秋，从宁远的邻县道县四马桥传来了杀“地主”的消息。当地的贫中农“造反派”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暴地杀害当地的地主、富农份子及其他的家属、子女。有些是全家老幼一齐被扔进贮藏红薯的地窖里，封死洞口，把他们全闷死。有些用大刀砍死，有些用梭镖戳死有一些吊在树上勒死，还有一些被活活地打死。这股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大屠杀歪风，不仅很快地蔓延全县各地农村，与道县四马桥毗邻的宁远梅岗乡农村，也照学道县的样子，率先在宁远县开了杀戒。接着，象瘟疫一样，很快地传到宁远各地农村。他们不仅杀害“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其家属、子女，一些些平时与他们有成见隔阂的人也被害了。有些全家被杀绝了的，财产被他们瓜分了，猪、狗、鸡都被他们吃了。

每天都有乡下杀人的消息传到城里，城里成份不好的人都很恐怖紧张，很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屠杀。当时我也非常的焦虑，我应该怎么办？后来想到：我应该把当地屠杀无辜的情况忙地向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反映。决定上北京一趟，同时也可避开当时的险情。长沙省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是不会有人管这事的。于是我与几个都是家庭成份不好的朋友商量好后，我们买好了去郴州的汽车票，准备到郴州后乘火车北上北京。上车的那天清晨，汽车站里有派出所的人在查问旅客，他是认识我们的，我们为了避开他，只好在汽车站外的公路拦住班车上的车。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郴州。因为早上为了应付上车的问题，大家都顾不上吃早餐，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咕噜地叫了。我们在车站旁找了一家饭铺去吃饭。当我们买好了票从厨房的取饭口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正准备要吃的时候，走过来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和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向我们讨饭吃。一听她的口音，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宁远人。我们每人赶了一些饭菜给他们吃后，想到：如今正是收割的季节，他们怎么会跑出来讨饭呢？于是我就问她为什么跑到郴州来讨饭？小姑娘眼泪巴沙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外婆接他们在外婆家作客，一天傍晚，村上去赶集回来的人告诉外婆，说他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已经被杀死了。村子上的“造反派”说要把他们俩姐弟找回去，斩草要除根。外婆吓得直发抖，抱着他们俩姐弟哭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外婆把她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了他们，包了一些煮熟的红薯，把他们领到去兰山县的公路上，要他们走到兰山后搭车去郴州，能走多远

走多远，越远越好，自逃生路。外婆流着眼泪，嘴里不断地吟着：老天爷，保佑他们吧……他们到了郴州钱用光了就讨饭了。

在这样凄惨、真实的事实面前，我把我不多的旅费匀出一块钱和二斤粮票给了他们，并默默在心里祝福他们能够平安，除此之外，当时的情况我实在无能给他们多一些帮助了。只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顺利到达北京，反映这场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大屠杀，希望中共中央当局能够及时制止它。

我们到在北京后，我立即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收。我想，即使他们本人不一定会看到这些信，他们名下办公室的人总会向他们汇报的吧。后来不久，中共中央当局责令四十七军去制止了这场还在蔓延的大屠杀。以致当地的一些“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得以幸存来，其中也包括了我們。

当我们返回到宁远后，我们认识的一些人被杀害了，我们一些乡下的亲戚也被杀害了。我有一个朋友，原藉道县，他的父母均在宁远一中教书，被道县乡下的贫下中农“造反派”抓回去杀害了，他成了孤儿，无家可归了。我们北门外欧村小学一位地主成份的教师被杀害了。欧村孪生兄弟其中的一个，被本村的“造反派”捆绑毒打后，罩在打谷子用的黄桶里闷死了。我的表嫂的一个弟弟被毒打后，活埋了。她那九十岁的老母亲被活活地吓死了……

后来，县民政局按照上级的批示，由生产小队造出被害人员的名单，层层上报至民政局，每个被害人赔偿二百元人民币。当那些幸存的被害者们的家属、子女去领钱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不好受的，但还要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的关怀”等等这一类口是心非的话。当时的市价，二百元还买不到一头猪。一条人命还不如一头猪值钱。谁会真正感谢造成杀害自己亲人的毛主席，共产党和政府呢？他们是有口难说，有冤无处伸呀呀！一些全家都被杀绝了，赔偿费无人领取，这些钱自然就落入了大队书记、大队干部或小队干部们的手中，任由他们花天酒地地去打平伙了。他们用被害者的赔偿费喝的酒，其实不是酒，是被害者们的血。他们用被害者们的赔偿费吃的鸡、鸭、鱼、肉，其实不是鸡、鸭、鱼、肉，是被害者们的肉啊！

据说，道县屠杀的人比宁远多得多，疯狂的屠杀在高潮时，许多被杀死后的尸体扔到河里，顺波流飘到下游，阻碍了航行的船只。沿江两岸附近的村子里，井水都有血腥气味，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不能饮用。一些村子的“造反派”怕被杀的人半路逃脱，用铁丝把每个人的锁骨串联起来，串成一串押到河边，杀死后再一个一个扔到河里。有一些身怀有孕的妇女被杀死后，疯狂的一些“造反派”生怕他们肚子里的胎儿不死，还要在孕妇的肚子上戳几刀。

天凡是有人性、有良知的人，听到这样恐怖、残暴滥杀无的暴行，都会毛骨耸然，都会悲愤无比的。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一条基本法律准则。然而，那些曾经组织“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非理非法组织的人，曾经凶残杀害许多无辜的人的主犯们，事后经法院审判，况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公理何在？

据说这场湘南宁、道两县大屠杀杀死了几万无辜的百姓。具体确切的数字到底有多少？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公开透露过，人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只知道杀死了许多，许多。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地的人现在也很少再提到它了，中国其它地方的人知道它的更是很少很少，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太深，给我的刺激太大，使我终身不会忘记。

时值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将至之际，我写这篇回忆，不仅为了悼念死于那场大屠杀中无辜的千、万同胞们，悼念“四五”、“六四”中死难的同胞们。同时，也悼念我那惨死的、亲爱的母亲——。 “文革”不久，我被当地派出所某指导员禁止在当地画画，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去求生存。我的母亲“戴”着“地主份子”的“帽子”，连同我的户口一齐被下放到农村。在她病倒在床还没有死的情况，当地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就把她活埋了，并瓜分了她的锅、瓢、碗、以及破烂的被子和蚊帐。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些恐怖、残忍的屠杀。我更衷心地希望中国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屠杀！我也衷心地希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屠杀！人类能够生活得安宁、自由、和平才是人类共同的希望。

二〇〇〇年清明节前

□ 原载《北京之春》二〇〇〇年六月号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